

第一章

六堡茶的历史沿革





中国茶的起源

中国茶，据传发端于上古神农氏。成书于东汉年间的《神农本草经》中有记载“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荼（茶）而解之”，而唐代陆羽所作《茶经》中也提到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，闻于鲁周公”。但是神农氏所处的上古原始氏族社会距今太过于久远，具体年代模糊，因此仅可目为传说，难成信史。

然则孔丘所撰《诗经》有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……采荼薪樗，食我农夫……周原膴膴，堇荼如飴……”之句，稍后成书的《尔雅》中也有“檟，苦茶”的记载，可见茶叶用于日常生活的时间不会迟于先秦时期。而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西周武王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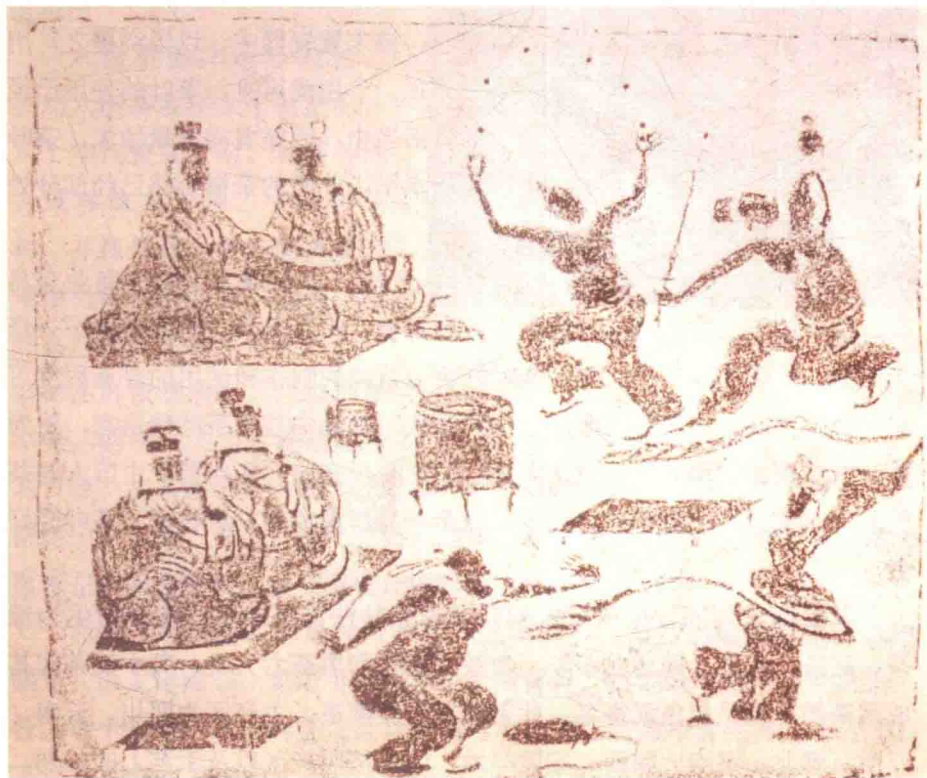
◎马王堆墓葬群中出土的竹简记载了随葬物品有“檟一筭”（即“茶一箱”）

纣时，巴蜀一带已用所产的茶叶作为“纳贡”^[1]珍品。此后茶叶的使用开始逐步传入黄河中上游地区，于是更有“自秦人取蜀而后，始有茗饮之事”^[2]的说法。对此，《茶经》中也明确记载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，一尺二尺，乃至数十尺。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，伐而掇之，其树如瓜芦，叶如梔子，花如白蔷薇，实如栟榈，叶如丁香，根如胡桃”。



◎阳陵出土陪葬品中所发现的茶叶残留物

茗饮之事”^[2]的说法。对此，《茶经》中也明确记载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，一尺二尺，乃至数十尺。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，伐而掇之，其树如瓜芦，叶如梔子，花如白蔷薇，实如栟榈，叶如丁香，根如胡桃”。



◎反映汉代宴饮情景的画砖。图中盛酒的大缸旁，另有一个小缸装醒酒用的茶水

[1] [晋]常璩.《华阳国志》第三卷·蜀志.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

[2] [清]顾炎武.《日知录》.岳麓书社, 1994

由此可推断，我国采摘野生茶叶制作茶饮的时间当在约3000年前，而巴蜀地区应是中国茶树的主要发源地之一。另据《晏子春秋》中所载“婴相齐竟公时，食脱粟之饭，炙三弋五卵，茗茶而已”，说明最迟在春秋时期的



◎清顺治三年李际期宛委山堂说郛本《茶经》，现藏于浙江图书馆

齐国竟公当政期间（公元前547～公元前490年），茶叶已作为菜肴汤料成为上层社会日常餐饮中的一部分。其后对于茶叶使用方式方法的记载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具体。据《广雅》云：“荆巴间采叶作饼，叶老者饼成，以米膏出之，欲煮茗饮，先炙，令赤色，捣末置瓷器中，以汤浇覆之，用葱、姜、橘子芼之，其饮醒酒，令人不眠。”由此可见，茶叶的使用已经自上而下地逐步渗透到了平民阶层的生活当中。而随着需求量增大，茶叶供应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较高的水平，此时的茶树必然已经部分处于人工栽培种植的状态了。

到了西汉年间，茶叶的使用更深入民间，甚至成为大宗的商业交易品，彼时的记录中有“筑肉臠芋，脍鱼鮓鳖，烹茶尽具，已而盖藏……牵犬贩鹅，武阳买茶”^[1]之句，当时社会上茶叶的制作和使用的普遍程度可见一斑。而2015年陕西省阳陵出土的汉代陪葬品中发现茶叶残留物，更为茶叶在中国的饮用历史提供了实证。说明至少在2150多年前，中国人对茶的品饮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，以至于身居皇位的刘启也成了茶叶爱好者。

其后两千年间，中国茶的制作和烹饮技法几经改革，逐步衍生为绿茶、红茶、青茶（即乌龙茶）、白茶、黄茶和黑茶六大类，其中黑茶因其成品茶的外观呈黑色而得名。此茶类属于发酵茶，主产区为四川、云南、广西、湖北、湖南、陕西、安徽等地，因此按照产区以及工艺上的差别，又主要分为湖南黑茶、藏边茶、普洱茶、六堡茶、湖北老黑茶、陕西茯茶以及安徽古黟黑茶七大类。

[1] [汉]王褒.《艺文类聚》卷35·僮约.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

茶叶在南方地区早期的应用

作为黑茶重要组成部分的六堡茶茶树是地方原有性系品种，“灌木型，中叶类，早生种。原产于广西苍梧六堡乡，临近的狮寨、贺州、蒙山、昭平等地也有少量分布……芽叶淡绿色，稀紫色，毛少，持嫩性较强……适宜在广西六堡茶区种植”^[1]。

六堡茶因产地而得名。虽然六堡茶乡在二十世纪七、八十年代曾从云南、湖南等地大量移植大叶种、中叶种茶树，并在最近十多年间再次大规模引种福云六号、桂绿一号等高产茶树品种，但原有的古茶树品群依然清晰。“特别是不倚、四柳（均为六堡茶区地名）等一些人迹罕至的山区，现存有一些直径达20~30厘米的‘野放’老茶树……不倚、五堡六堡交界处、四柳、高枳等多处有不少树干直径达30厘米左右的古茶树。据专家估计树龄超过700年……”^[2]



◎六堡与五堡交界处的一棵老茶树，基部干径约为16厘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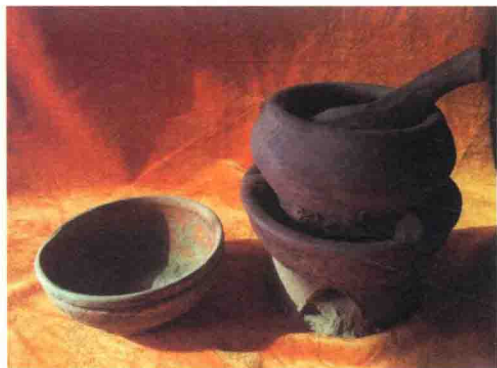
而关于六堡茶茶树品种及制作工艺的源头，虽然当地现有王母娘娘赐茶、西王母赐茶、龙母引种等多个所谓传说，然则均不见于史料典籍，皆为近十年来所闻，内容荒诞且无稽可考，仅可目为耳食笑谈。【注一】不过岭南自古多瘴气，楚越地区先民采摘草药煎熬成汤后饮用以消暑祛湿、清热解毒的习俗却由来已久。巴蜀楚越之地野生茶树分布广泛，茶叶

[1] 陈宗懋.《中国茶叶大辞典》·第一章 中国茶树品种与品系.中国轻工业出版社, 2000

[2] 彭庆中.《中国六堡茶》.漓江出版社, 2012

被煎煮成汤的历史绝对不会短暂，是故《尔雅》中“苦茶”一词也有“叶可炙作羹饮”的注释。因此可以推断，汉时从属于交趾的两广地区已经大量使用茶叶制品，是故《茶经》引《桐君录》所述称“又南方有瓜芦木，亦似茗，至苦涩，取为屑茶，饮亦可通夜不眠。煮盐人但资此饮，而交广最重，客来先设，乃加以香茱萸”^[1]。【注二】

但从上述史料中也不难推断，此时在南方地区，茶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草药来使用。^[2]茶叶从药用到成为日常饮品之间的过渡期，恐怕贯穿了整个汉朝。从“孙皓每飧宴座席，无不率以七胜为限。虽不尽入口，皆浇灌取尽，曜饮酒不过二升，皓初礼异，密赐茶茱以代酒”^[3]这段最早的“以茶代酒”记载中可以看出，直至东吴末年，集体化饮茶的方式才逐渐产生，茶饮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习俗在南方地区才逐渐形成，而北方地区茶饮风气的形成则应该更为靠后。北魏中大夫杨元慎曾以“吴人之鬼，住居建康……菰稗为饭，茗



◎西汉民间所用的陶制茶具



◎魏晋时期的博弈陶俑，其中站立的侍女陶俑手托一盘茶杯，表明了汉末茶饮在社会生活中已经相当普遍



◎德清窑黑釉托盏（东晋），杭州老和山兴宁二年（公元364年）墓出土

[1] [唐]陆羽.《茶经》第七·之事.上海古籍出版, 2009

[2] [日]布目潮风.《东京饮茶简史》·中国吃茶文化史.岩波出版社, 1995

[3] [晋]陈寿/[宋]裴松之.《三国志》·吴志·韦曜传.岳麓书社, 1994

饮作浆”^[1]为由戏辱南梁使臣陈庆之。由此可见，起码直至南北朝时期，北方地区仍然认为经常喝制作浓稠得像浆一样的“茗饮”是南方地区的一种陋习，但同时也可以看出，此时“茗饮”在包括梧州在内的整个“吴地”已经蔚然成风。



◎南朝刘宋时期壁画上所描绘的皇室仆役队伍中，走在最后面的官员顶着一套茶具

茶饮在唐代的推广

事实上，虽然自隋朝开始，民间已有“开门七件事，油盐柴米酱醋茶”的说法，但是直至唐代初期，北方地区还未习惯将茶饮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。“茶古不闻食之，近晋以降，吴人采其叶煮，是为茗粥；至开元、天宝之间，稍稍有茶，至德、大历遂多，建中以后盛矣。”^[2]

中唐以后，茶饮之风才自南而北地盛行全国。“南人好饮之，北人初不多饮。……自邹、齐、沧、棣，渐至京邑，城市多开店铺，煎茶卖之，不问道俗，投钱取饮。……茶道大行，王公朝士，无不饮者。……古人亦饮茶耳，但不如今人溺之甚，穷日尽夜，殆成风俗，始自中地，流于塞外。”^[3]

茶道的盛行并“流于塞外”，致使茶叶成为大宗的社会消费品，唐朝政府于是开始立茶课征收茶税，而随着唐帝国交通渠道的不断拓展以及茶叶的销边出塞，更催生了以茶易马的茶马互市大兴，榷茶制度亦发轫于此。需求量不断增长，促使唐代茶产区面积迅速扩张。同时由于我国第三个温暖期出现在隋唐时代（公元600~800年），据记载，玄宗时期长安地区已经可以大规模种植梅树。到了天宝十年（公元751年）以后，长安地

[1] [北魏]杨炫之.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二·城东·景宁寺.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58

[2] [唐]杨晔.《中国烹饪古籍丛刊补遗》·膳夫经手录.中国商业出版社, 1985

[3] [唐]封演.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六·饮茶.台湾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

区引种的柑橘开始结果，穆宗皇帝还曾以宫中橘树所产的橘子赏赐臣下，获赐的翰林学士李德裕还为此撰写了一篇《瑞橘赋》以示感谢。^[1]

在这种有利的气候因素影响下，也促进了茶叶种植的大发展。因此中唐过后，南方地区的丘陵和山地被大量开发出来，用于种植各种经济作物，茶树就是其中之一。而且产茶地和交易区也不再集中于巴蜀、江淮、两湖等地，而向岭南的交广地区大幅拓宽。同时，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也对南方茶叶的北运注入了强大动力，“自扬、益、湘南至交、广、闽中等州，公家运漕，私行商旅，舳舻相继”^[2]。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量必然刺激茶叶的生产，促使种茶和制茶技术不断革新，茶叶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。“如面积并不大的湖州顾渚山，每年贡焙就高达18400多斤。常州义兴县所产的紫笋茶，也是当时名品，与顾渚山紫笋茶一起被列为长庆年间的贡品……与歙州毗邻的饶州，元和初仅浮梁一地，‘每岁出茶七百万驮’、‘税十五余万贯’。”^[3]



◎《宫乐图》（唐）。该图描写后宫嫔妃十人，围坐于一张巨型的方桌四周，有的品茗，也有的在行酒令。从《宫乐图》中我们可以看出，茶汤是煮好后放到桌子中央。饮茶时用长柄茶勺将茶汤从茶釜盛出，舀入茶盏饮用。茶盏为碗状，有圈足，便于把持。可以说这是典型的“煎茶法”场景重现，也是晚唐宫廷中茶事昌盛的佐证之一

[1] 史念海. 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. 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98年第1期

[2] [唐]李吉甫.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. 中华书局, 1983

[3] 孙洪升. 茶叶与中央帝国的兴衰. 《古今农业》2006年第4期

与此同时，包括广西在内的岭南地区，由于气候和地理环境适合，也被中央政府有意识地推行茶叶种植，并从政策上鼓励种茶。宪宗年间，韦丹任容州（今广西北流县）刺史时，就“教民耕织，止惰游，兴学校，屯田二十四所，教种茶麦，仁化大行”^[1]。容州与梧州相邻，此时容州在政府的推动下大力“种茶”，难免会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，茶树的种植技术向梧州地区流转成为可能。

此时茶产业的迅速发展还可从朝廷征收的茶税中得到集中体现。自德宗贞元九年（公元793年）诸道盐铁使张滂奏请开设税茶以后^[2]，此法在唐朝便常行不废，且税率不断提高，成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，并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榷茶制度。据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及《唐会要》所载，唐政府所获的茶利从贞元九年起，直至唐末，始终呈上升趋势。

茶饮程序在唐代的繁化

不过有趣的是，茶道虽起于民间，但唐代最为繁盛的茶文化却在宫廷和士大夫阶层，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赐茶制度和赠茶习俗。每年新茶下来后，皇帝都要以茶赏赐勋戚重臣，以示恩信。赐茶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很长时期里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。

正是由于茶道受到皇室以及上层社会的热捧，其时的茶饮程序就变得十分考究且仪式化。流传至今的“大唐君臣清平茶说”，曾记载了天宝二年（公元743年），玄宗皇帝邀请大学士李白品尝全国各地进贡的新茶贡品，李白乘机进《清平调三首》取悦玄宗^[3]。其间玄宗设茶赏赐，程序繁多，前后分为备器、鉴赏茶饼、炙茶、碾茶、筛茶、候汤、投盐、舀汤、置茶兑汤、分茶、敬茶、闻茶、观色、品茶、谢茶等十五个步骤，从中可以看出盛唐时期宫廷茶道的奢华风气。

而从上述的这些程序中也不难看出，唐代的茶饮方式已从南北朝以来的汤煮改为煎饮，调味料由葱、姜改变为少量的盐花^[4]，同时对影响茶汤品质各方面因素认识进一步细化。例如不同水质对于茶汤质量影响、不

[1] [宋]宋祁，欧阳修.《新唐书》·列传·韦丹.商务印书馆，1936

[2] [后晋]刘昫.《旧唐书》·志·食货（下）.中华书局，1975

[3] [唐]李肇.《松窗杂录》.商务印书馆，2013

[4] [唐]陆羽.《茶经》第六·之饮.上海古籍出版，2009

◎陕西法门寺出土的金银系列茶具。据地宫出土的《物帐碑》记载，这批茶具具有“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，龟一枚重廿两，盐台一副重十一两，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，茶槽子、碾子、茶罗、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”等

◎镏金羯摩纹三足架银盐台



◎镏金鸿雁纹银茶碾子



◎镏金茶槽子





◎ 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

◎ 素面淡黄色带托琉璃茶碗。这件琉璃茶碗是唐僖宗李儇赐给佛刹供奉的。在《衣物帐》中，称为“琉璃茶碗拓子一副”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器物共二十件，其中除茶碗、茶托确为我国制造外，其余都是伊斯兰玻璃器皿



◎ 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



◎ 镏金飞鸿纹银匙



◎ 镏金卷草纹长柄银匙

同沸水程度对于茶汤质量的影响、不同材质茶具对于茶汤汤色的影响等等。这些细致入微的工序，使得宫廷茶道所使用的茶器茶具也表现得非常精致贵重。1987年西安法门寺出土一套唐僖宗恩赐的宫廷金银系列茶具中，就有茶笼、茶碾、茶罗子、茶炉、茶匙、茶盆、茶碗、茶托、调料盛器等十多种器具，其使用流程涵盖了从茶叶的贮存、烘烤、碾磨、罗筛、烹煮到饮用的各个环节。

在宫廷的直接带动下，当其时中央机关的饮茶之风也相当盛行，“御史台三院……兵察常主院中茶，茶必市蜀之佳者，贮于陶器，以防暑湿。御史躬亲缄启，故谓之‘茶瓶厅’”^[1]。作为堂堂中央检察机关的御史台竟然成了“茶瓶厅”，而且所制作的茶汤还要小心翼翼地封存好，只能由最高行政长官亲自开启方可饮用，唐人对茶饮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。以至于太常寺丞王建也慨叹“天子下廉亲考试，官人手里过茶汤”。



◎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的唐代倒流茶瓶，证明当时对茶具工艺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

另一方面，盛唐之时，由于社会富足，大量的粮食被用于酿酒以供享受。但安史之乱过后，大唐由盛转衰，国力下滑，社会生产力大幅下降，这导致了粮食价格飞涨。为了遏制奢靡浪费之风，减少粮食耗费，重新稳定粮价，自肃宗乾元元年（公元758年）起，中央政府颁布政令，在全国范围内限制沽酒，对酒课以重税^[2]。其时一斗酒价约三百文，可买六斤茶叶，杜甫有诗云：“街头酒价常苦贵。”

酒价飙升之下，嗜酒者转向饮茶，文人和僧侣也大兴以茶代酒之风，把初唐以来盛行的奢华酒宴变为俭朴典雅的茶宴或茶会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，在各阶层中广为流传。这种风气逐渐在文人之间形成了互相赠茶的定俗，主要是为了表明对友情的尊重，譬如“茶仙”卢仝所作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，其灵感就是因朋友赠茶而起。

[1] [唐]赵璘.《因话录》·微部.商务印书馆，1941

[2] [后晋]刘昫.《旧唐书》·志·食货（下）.中华书局，1975

炒青茶的出现

朝野共兴茶饮之风，导致中唐过后茶叶的社会销售量日益增大，这必然刺激茶叶的生产，促使种茶和制茶技术不断革新，茶叶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。

从现存的史料典籍上看，唐时的茶叶制作以蒸青团茶为主。前期，茶饮方式制法粗糙，如同喝菜汤，懿宗咸通年间太常博士皮日休在其所作《茶中杂咏》中，提及初唐时期的茶饮有云：“称茗饮者，必浑而烹之，与夫淪蔬而啜者无异也。”中唐以后，制茶方法向精细方向全面发展，蒸青作饼的工艺逐渐完善。《茶经》所载：“晴采之、蒸之、捣之、拍之、焙之、穿之、封之、茶之干矣。”即此时一套完整的蒸青茶饼制作工序包括了蒸茶、解块、捣茶、装模、列茶晾干、穿孔、烘焙、成穿，最后封茶。



◎《调琴啜茗图》（[唐]周昉）。图中描绘了大历至贞元年间，宫廷贵族妇女一边饮茶一边弹琴消遣的场景，可见茶饮在当时已经成为时尚

同时，成型的茶饼拍制方法还有一定的“规承”：“规”为铁制，或方或圆；“承”又称“台”或“砧”，一般都以石头打磨而成，用于制作团茶或饼茶。虽然其时“饮有粗茶、散茶、末茶、饼茶者”^[1]，但还是以团饼茶制作为主，少数地方也制作蒸而不捣，或捣而不拍的散茶和末茶。

[1] [宋]宋祁，欧阳修，《新唐书》·志·食货（四），商务印书馆，1936

另外，在蒸青茶工艺快速发展的同时，个别地方还出现了炒青茶。刘禹锡在任夔州刺史时所作的《西山兰若试茶歌》写道：“宛然为客振衣起，自傍芳丛摘鹰嘴。斯须炒成满室香，便酌沔下金沙水。”把山边的野生茶叶采摘之后直接入锅，快速炒香，然后注水煎沏成茶。这种方式虽然因简就易，但已经具备了炒青茶的雏形。

种茶和制茶技术的革新改良，令茶叶的产量和质量快速提升，从而使唐帝国的茶叶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又能确保“流于塞外”。其实早在贞观十五年（公元641年）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时，陪嫁的礼品中就有来自湖南的茶叶。^[1]而宪宗元和年间翰林学士李肇所记下的一则故事也非常有趣：“常鲁公使西蕃，烹茶帐中，赞普问曰：‘此为何？’鲁公曰：‘涤烦疗渴，所谓茶也。’赞普曰：‘我此亦有。’遂命出之，以指曰：‘此寿州者，此舒州者，此顾渚者，此蕲门者，此昌明者，此濉湖者。’”^[2]

虽然赞普未能准确说出这些茶叶品种的名称，而只能大致地说出各自的产地，但从他摆出来的茶叶品种可以看到，当时南方出产的茶叶已经在西北地区大量销售。而且寿州、舒州、顾渚和濉湖等地当其时出产的几乎全是蒸青团茶，由此可以推断，唐时蒸青技术仍然是制茶工艺的主流，其他的茶叶杀青技术或已经没落，或依然处于萌芽状态。



◎唐代的煎茶法非常讲究对入茶之水的运用

[1] 索南坚赞.《西藏王统记——吐蕃王朝世系明鉴》.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85

[2] [唐]李肇.《国史补》卷下.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57

入宋以后的茶道

比及入宋，茶道之风日盛，茶已经成了全社会普及的饮料，特别是上层社会嗜茶成风，斗茶的风气甚至深入内宫，即便皇帝也不能免俗，仁宗、真宗、神宗、徽宗皆深谙此道，徽宗赵佶更是亲自撰写了《大观茶经》。上行下效，有宋一代，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好茶崇茶的风气。《大观茶论》



◎《斗浆图》局部（[宋]佚名）。从图中可以看出斗茶之风渗透到了宋代社会的各个层面

有云：“天下之士，励志清白，兢为闲暇修索之玩，莫不碎玉锵金，啜英咀华，较筐篚之精，争鉴裁之别，虽下士于此时，不以蓄茶为羞，可谓盛世之清尚也。”

其时茶风之所以盛行，皆因茶叶消费被赋予了浓郁的文化色彩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商品消费。饮茶已经成为人们思想文化的载体和相互之间表达情感的媒介，同时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伦理观念，“茶之为物，祛积也灵，寐昏也清，宾客相见，以行爱恭之情者也。天下之人不能废茶，犹其不能废酒，非特适人之情也，礼之所在焉”^[1]，可见其时饮茶已被提到了“礼”的高度。除了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世界表达媒介之外，茶饮的社会实用性在当时也得到了高度提升。“宋人对茶有着无限的热情，美食家们竞相发明新的花样，为了定其优劣还定期举行比赛。”^[2]这种以茶为媒的饮食比拼在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说郛》、《武林旧事》等宋朝的史料典籍中并不少见，至少苏轼、王安石和蔡襄等史册留名者就是当时出名的茶

[1] [宋]黄裳.《演山集》卷四十六·茶法.台湾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

[2] [日]冈仓天心.《说茶》.百花文艺出版社,1996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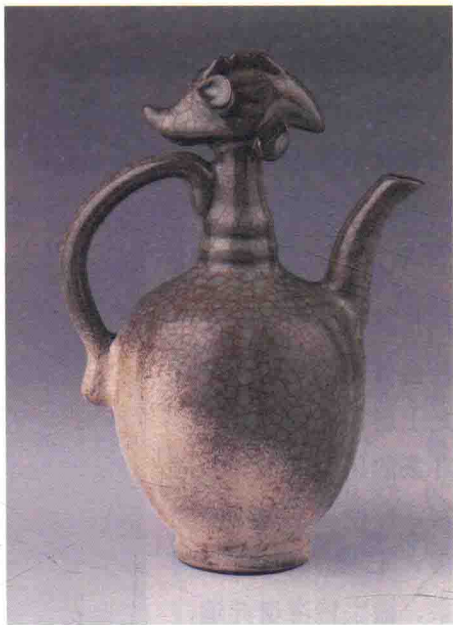
客与美食家。

与此同时，遍布各地的茶酒阁子、茶肆和茶坊也说明茶饮已经进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甚至成为一些历史片段的记录者。太祖赵匡胤驾崩后，其弟赵光义即位为太宗。太平兴国四年（公元979年）八月，太祖之子赵德昭因遭太宗疑忌，只好跑到汴梁城中一个茶酒阁里闭户自刎。^[1]由此可见，其时汴梁的茶肆已经相当普遍，“出朱雀门东壁……以南东西两教坊，余皆居民或茶坊。街心市井，至夜尤盛”^[2]。这个现象折射出宋人饮茶之风的社会普及性。

即便宋室南渡之后，临安的茶坊数量依然不在少数。“平康诸坊……皆群花所聚之地。外此诸处茶肆，清乐茶坊、八仙茶坊、珠子茶坊、潘家茶坊、连三茶坊、连二茶坊，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……凡初登门，则有提瓶献茗者，虽杯茶亦犒数千，谓之点花茶。”^[3]

茶肆密布，不仅满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茶水消费，还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，很多商品交易活动也在茶肆中得以完成^[4]。这又反过来推动了茶叶消费的进一步提升，以至于其后政府专设茶酒司来掌管处理茶肆的日常茶饮流程和礼仪。^[5]

茶不仅在当时的世俗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在宗教社会中也大行其道。宋时僧道两兴，寺院庙宇中的茶叶除了僧侣和道人们自己饮用或赠送客人之外，还被用来供奉。“觉林院收茶三等，待客以惊雷莢，自奉以萱草带，供佛以紫茸香。盖最上以供佛，而最下以自奉也。”^[6]



◎宋代官窑凤首茶瓶。这件器具说明宋代对于茶具的形式已经相当讲究

[1] [宋]李焘.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十·太平兴国四年八月.中华书局点校本, 2004年

[2] [宋]孟元老.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二·朱雀门外街巷.文化艺术出版社, 1998年

[3] [宋]周密.《武林旧事》卷六·歌馆.文化艺术出版社, 1998

[4] 李春棠.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.《湖南师院学报》1984年第3期

[5] [宋]吴自牧.《梦粱录》卷十六·茶肆.文化艺术出版社, 1998

[6] [宋]朱或.《萍洲可谈》卷一.台湾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

宋代两广地区的茶类

但相对于前朝而言，随着宋帝国领土的收缩，茶产区也开始向东南转移。据《茶经》记载，唐代茶叶主产区分布在“思（今贵州务川）、播（贵州遵义）、费（贵州德江）、夷（贵州石阡）、鄂（湖北武昌）、吉（江西吉安）”等十州。到了北宋时期，茶叶主产区开始向福建和两广等低纬度地区延展。而此次产业转移，除了政治影响，还有自然因素，因为从五代至北宋的这段时间内，中国气候明显由暖转寒，宋代的常年气温较唐代暖期要低 $2\sim 3^{\circ}\text{C}$ ^[1]，北方茶产区的茶树大批冻死，茶树推迟萌发，结果也促进了茶叶主产区的南移，是故“《本草拾遗》曰：皋卢茗，苦平，作饮止渴，除疫，不睡，利水道，明目。生南海诸山中。南人极重之。……《广州记》曰：西平县出皋卢，茗之别名，叶大而涩，南人以为饮”^[2]。

大量的茶叶产品除了用于国内贸易，茶马互市也随之扩大。由于茶能解毒祛病、解油腻、助消化，因此在西北、西南地区受到普遍欢迎，以至“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”^[3]。由于茶叶作为“互市”的必要物资，直接支撑中央财政，因此宋王朝直接把茶列入国家专卖，并强化榷茶完善制度。【注三】但与此同时，“天下茶皆禁，唯川峡、广南听民自买卖，禁其出境。……时远方若桂州修仁诸县、夔州路达州有司皆议榷茶，言利者踵相蹶，然神宗闻鄂州失催茶税，辄蠲之”^[4]。这样相对放开管理的制度促使广南地区茶叶的产销大幅度提高，此时的岭南封州（今广东省封开县一带）已有出产“春紫笋茶，夏紫



◎顾渚紫笋茶茶芽

[1] 朱自进《茶史初探》·宋元时期茶业的发展和变革.中国农业出版社, 1995

[2] [宋]李昉.《太平御览》·卷八六七·饮食(二十五).中华书局, 1960

[3] [元]脱脱.《宋史》·本纪·第二十六.中华书局, 1985

[4] [元]脱脱.《宋史》·志第·食货·茶.中华书局, 1985